

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

迟云飞

提 要 宋教仁不是“二民主义”者,他是民生主义的信奉者并愿意实行。宋教仁对社会主义作过认真的研究,也是重要宣传者,但是宋教仁不同意在当时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赞成国家社会主义包括民生主义,主张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利用国家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晚清民初,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类似宋教仁见解的革命党人很多,这预示了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关键词 宋教仁 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 国家社会政策

20 世纪之初,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中国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宣传并一定程度推崇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是晚清民初革命党人,这表现了年青的革命志士对国家乃至人类未来前途的关怀和思考。革命党重要领袖的宋教仁也是关注社会主义的人士之一。厘清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宣传和思考,不仅对于研究宋教仁非常重要,对于了解 20 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以及理解后来中国政治变动的走向,也有很大的意义。^①

一 不是“二民主义”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孙中山对宋教仁多所批评,影响国民党人也不不少人批评宋教仁,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宋教仁在民初组织国民党时放弃民生主义纲领。1949 年以后大陆学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宋教仁为“二民主义者”。^②

说宋教仁是二民主义者,有一定的理由。我们试观察和比较以下几件事情。

① 关于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笔者见到三篇论文。谢正清《宋教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认识》(《益阳师专学报》,1994 年第 4 期),该文认为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晰,又认为宋教仁拒绝平均地权,恐对宋教仁的思想有误读。陶季邑《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衡阳师专学报》,1994 年第 3 期),认为宋教仁全部接受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并重点宣传平均地权。对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差异似重视不够。郝延军《简论宋教仁的社会主义观》(《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认为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态度,立足于他既定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工具,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该文似对 1906 年以后宋教仁仍同情社会主义估计不足。本文即在上三篇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

② 如有的学者说:“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见吴剑杰:《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78 年第 4 期。有的学者认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是很信仰的,(但是)这些人在‘平均地权’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持保留态度,缺少孙中山那样的激进色彩”。见章开沅:《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载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成都:巴蜀书社 1989 年版,第 260 页。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起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阐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宗旨:“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府为主义。”^①显然,宗旨中包含了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没有民生主义。我们试比较此前于1910年2月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盟书,可以观察其宗旨的微妙不同。中华革命党规定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②。可见一个坚持民生主义,一个似乎不太重视民生主义。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于1912年3月改为公开政党,宣布其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其政纲的第三条又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③此次改组是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故坚持民生主义的政纲。1912年8月,宋教仁组织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新的党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党纲中则有一条“采用民生政策”。^④民生主义党纲淡化为不够明确的“民生政策”。在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筹划合并时,统一共和党提出的三条件之一就是废去民生主义。另一个愿意与同盟会合并的国民公党也反对将民生主义写进党纲。经过同盟会代表的力争,用了折中的“民生政策”。^⑤所以,新的国民党之所以淡化了民生主义,主要是向其他党派妥协的结果。

即便是为了争取他党与同盟会合并的妥协,我们观察,至少宋教仁不象孙中山那样坚持民生主义。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是由孙中山主持同盟会的改组,孙可能即使不组织大党,也要坚持写进他的民生主义。

那么宋教仁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呢?

1911年2月至3月,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长文《二百年来之俄患篇》。文章不是讨论土地问题或社会主义,而是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长文在论述不应允许俄人在蒙古、新疆购地造屋时说:

吾尝谓我国将来之土地政策宜亟师社会主义之意,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⑥

分析这段话,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观点的表达是自然流露,没有勉强,也没有任何顾忌,显示宋教仁是完全赞成或者是主张民生主义的。第二,这段话中他把几点主张作为符合社会主义理论或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即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保护多数国民利益。这几点,都与当时孙中山表达的见解惊人的一致。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其起草的《国民党宣言》公开刊登在《民立报》上,其中阐释国民党的党纲“民生政策”为:“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⑦虽然宋教仁的解释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解

①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页。

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9页。按此中华革命党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③ 见迟云飞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修订版),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④ 《宋教仁集》,第418—419页。

⑤ 见《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146页。

⑥ 《宋教仁集》,第179页。

⑦ 《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第749—750页。

释稍有不同(“国家社会主义”),但显示宋教仁此时仍然是赞同民生主义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无论是今人的理解还是宋教仁当时人的理解,都可以把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包括在内。

如果说《国民党宣言》的坚持国家社会主义是为了争取孙中山支持改组,并平息一些同盟会员的不满的话,那么宋教仁在以后的演讲中又谈到民生主义,并且直截了当:

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①

可以看出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理解是很相近的,当然宋强调的重点是“国家社会主义”。由此我们也可以观察,虽然有些同盟会革命党人不太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其实赞成的人还是很多的。换句话说,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在革命党人中间还是很能引起共鸣的,包括以前很多人误解为二民主义的宋教仁,也是如此。

二 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宋教仁不仅不是二民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问题还抱有很大的兴趣,并且作过宣传。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宗旨之一,稍后在民报发刊词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宋教仁担任《民报》的庶务,孙中山的这些文章他都会读过,当然孙中山的演说他也都听过,不过从宋教仁日记观察,最初民生主义的确并没有引起宋教仁十分注意。我们可以推测:宋教仁从个人的交往中,从阅读孙中山的文章和听他的演讲,比较清楚知道了民生主义。但宋教仁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信从别人的人,要他接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需要宋教仁自己的研读和思考。

中国知识人有深厚的关心民疾民苦的传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使知识人很容易接受重视下层社会、同情民众疾苦和带有平等平均色彩的社会主义理念。另外,中国的历史上,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都有不少知识人渴望没有战争、没有欺诈、生活安定均平的桃花源般的社会,这也使中国知识人容易憧憬描述了未来美好远景的共产主义理念。自鸦片战争以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绝非偶然。这是宋教仁这一代新知识人接受某种程度社会主义理念的心理基础,而宋教仁到日本之际,正是中国留学生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之时。宋教仁正是在此种情境下开始对社会主义的了解、研究和某种意义上宣传的。

依据现有资料,宋教仁注意社会主义从1906年初开始。我们先看宋教仁的两则日记:1906年1月1日:“至宫崎滔天家贺年,晤得滔天兄宫崎民藏,日本之社会主义者也,谈良久。”^②1906年1月18日:“至宫崎滔天家。滔天未归,晤其兄民藏,谈良久,出其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观之,言平均地权之说者也。”^③

这说明,宋教仁最初接触社会主义,曾受了宫崎民藏乃至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宫

①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第447页。

② 刘晴波、刘决决等整理:《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③ 《宋教仁日记》,第121—122页。

崎民藏及其弟宫崎寅藏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好友,宋教仁患神经衰弱症,曾在宫崎寅藏家休养,得到寅藏及其一家的大力帮助。20 世纪之初,日本流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1903 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出版,立即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知识人中间流传。与宋教仁接触较多的宫崎民藏则曾潜心研究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又曾专门到西方各国考察土地问题。他认为天造物的土地是人类的基本人权之一,应该由人类共有,主张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并组织土地复权同志会。1905 年,民藏出版《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即前述他向宋教仁介绍的书。

也许与宫崎民藏的影响有关,1906 年 2 月 10 日至 20 日,宋教仁花费很多时间翻译《露国之革命》,后来以《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的题目刊登在《民报》上^①。文章里提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及俄国共产党的情况,也介绍俄国工人总罢工的情况:

圣彼得堡职工之响应,为昨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大骚动是也。盖传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于职工及农民间,而使之投入革命党者,此既往四十年间革命党所皆劳心焦思者也。夫欧洲劳动问题之大势,前已侵入露国而不能拒矣……露国劳动社会之夙受影响于西欧之劳动问题,无可疑矣。

总同盟罢工之令下,各处汽车遂一时停止……国内交通断绝,宛如太平洋之孤岛,消息不灵,食料腾贵……如此现象,国人皆欢迎翼赞不绝,虽穷困苦迫之境日甚一日,而乃不少变。革命党诸首领,皆有蹈死不悔之气象。

宋教仁对这篇文章的感悟,更多的是专制独裁将让位于民主宪政的历史趋势,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引起他的注意,此后宋教仁对社会主义问题有更多的关怀与研究。前面说 1906 年 1 月 18 日宫崎民藏向他介绍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宋教仁尚没有更多注意,及至 1906 年 3 月 8 日,宋教仁主动向宫崎民藏索要该书。^②

宋教仁不仅得到了《人类之大权》,还由民藏介绍,接触俄国波兰籍民粹派党人彼尔斯基。宋教仁 1906 年 3 月 10 日日记记:

上八时,宫崎民藏来,赠余以《人类之大权》一部,并言今日下午邀余同至芝区访俄国革命志士ビルストスキ,余颉之。下午……遂至芝区……坐良久,俄国人ビルストスキ乃至……(ビルストスキ)云革命之事,不可从一方面下手,专讲政治的革命,必不能获真自由,专讲社会的革命,亦必不能获真自由。必二者俱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又云,己向来系极专主张民主主义的,然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国,亦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尝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上二方面而并欲改良者也云云。^③

彼尔斯基(ビルストスキ)所讲的“社会的革命”的内容尚不十分明晰,但从其对美国、法国政治的批评,显然是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物,而其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同时进行的主张,与孙中山颇相类似。

如果说以前宋教仁还只是一般的听听、了解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及其运动,这以后宋

① 见《宋教仁集》,第 27—40 页。

② “写致宫崎民藏一片,索其以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赠余也。”见《宋教仁日记》,第 152 页。

③ 《宋教仁日记》,第 152—152 页。

教仁则是认真进行了一些研究。1906年4月8日,宋教仁开始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文章原载日本《社会主义研究》。^①《社会主义研究》为日本社会党所办刊物。日本社会党1906年成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堺利彦、片山潜、幸德秋水等创建。在《社会主义研究》的创刊号上,首次刊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社会主义研究》刚刚创办,宋教仁就已经阅读并动手翻译其文章,可见宋教仁此时对社会主义问题已经相当关注。

“万国社会党”现译为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文章先介绍第一国际(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主要的篇幅介绍“万国社会党”,即第二国际。

宋教仁不仅翻译这篇文章,而且以自己的了解,对文章的内容及文字作了改动:“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嫌其文不秩序,多为易之。”^②在《民报》刊登时,宋教仁又说明:

万国社会主义进行之势方兴未已,故记事亦不得即视此为杀青之期,如近日法国社会党两派已经复合,别生出“社会主义与爱国心”之一问题,将来次期万国大会必为剧烈之争点。吾人暂搁笔,以拭目候之可也。^③

从这个说明可见宋教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和了解程度。

宋教仁在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的过程中,感觉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党的国际联系,因此,他于1906年4月16日致函日本社会党要求交换杂志。当时宋教仁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庶务,负责刊物的印刷、发行诸事。他的日记记:“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夜,写一信致平民舍,日本社会党之本部机关也,询问其有无《平民新闻》及《直言》报,并欲与之交换《民报》云云。”^④显然,宋教仁是把日本社会党看成是自己的同道,但究竟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同道,还是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道?笔者以为是前者居多,后者也有一定的份量。当然,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比较复杂,有的实际上是主张一些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宋教仁完全赞成;有的如幸德秋水后来就转向无政府主义,这恰恰是宋教仁所不赞成的。

从4月3日购买《社会主义研究》,4月8日开始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4月17日译完^⑤。可见宋教仁对文章的重视。翻译的过程,也是研究和艰苦求索的过程。那么,宋教仁从《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可以了解哪些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可以知道哪些国际共运的理论呢?文中开头就说:“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 Bourgeois 与平民 Proletaruns 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其不平等之极,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

又叙述《共产党宣言》最后的一段:“马尔克之作 Karl Marx《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

① 《宋教仁日记》,第166页。

② 《宋教仁日记》,第167页。

③ 文刊《民报》第5号,说明见《宋教仁集》,第56页。

④ 《宋教仁日记》,第169页。

⑤ 《宋教仁日记》,第169页。

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呜呼!是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

文章述一切生产资料归公有的 1877 年大会决议:“社会所以存在之基础之土地,与其他一切之生产机关,若被握于个人或特别之阶级之掌中而为私有财产时,则其必然之结果,必使劳动阶级受压迫贫穷饥饿而不能遁免。故大会宣言:以自由自治之团体组织之,而以土地及其他一切之生产机关,归于代表全国民之国家之所有。”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刊出后,宋教仁继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研究。1906 年 5 月 10 日“购得《独立评论》一册,中载有《社会主义年表》,记自德国大革命以来至近日各国社会党之运动,按年列表,甚详也。”^①

1906 年 8 月 25 日日记“定购《读卖新闻》一份,是晨即至。阅之,有俄国一般同盟罢工事及古巴之叛乱。又有《记世界之社会党》一篇,言美国新闻《评论之评论》中有プリス氏,计算世界社会主义者之总数为七百六十万一千三百八十四人,其国别如左(按此但西洋各国之社会主义者)。”宋教仁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情况详细列表记在日记里,有德、法、美、英、意、俄等 22 国,包括其社会主义者数、在下议院中的议员数、所办报刊数。宋教仁如此不厌其烦列了这样的表,表明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按宋教仁所列表,可以看到德、法两国社会主义者最多,占议院人数比例也较大。德国社会主义者 300 余万人,下议院议员 397 人,有社会主义者 81 人;法国社会主义者 112 万人,下议院议员 584 人,社会主义者 75 人。社会主义者占议院比例最大的是瑞典,议员 23 人中,有社会主义者 14 人,超过了半数^②。

从本节的叙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宋教仁对社会主义作过宣传,并且是晚清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者之一。

三 四种社会主义的取舍

宋教仁虽然对社会主义作过研究、宣传,但他的主要兴趣和目标,还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1911 年,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集中谈了他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流派的意见。

为什么会有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流行?宋教仁的解释是:

社会主义之发生,盖原于社会组织之弊。自欧西各国物质文明进步,产业制度生大变革,经济组织成不平等之现象,贫富悬隔,苦乐不均,于是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益激急增盛,乃唱为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其说逐渐繁衍,殖长于欧西各国。^③

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应该既有现实的社会原因,又有其思想渊源。按宋教仁的思路,工业革命以后,“产业制度生大变革”,“贫富悬隔,苦乐不均”,是社会主义发生的现实根源。而“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

① 《宋教仁日记》,第 178 页。

② 《宋教仁日记》,第 216 页。

③ 《社会主义商榷》,《宋教仁集》,第 287 页。本节以下未注明者,均出此文。

想”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今日我们从学理的角度观察,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笔者以为更多的是平等思想,当然,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平等观念,都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宋教仁之所以再加上“自由”二字,应该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意味宋教仁把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视为自己争取民主政治的同道。

宋教仁把社会主义学说分为四种:

一是“无治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是专保护“资本家与地主”的,故主张“国家及政府万不可不废去之”。

二是共产主义,包括“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主张“一切之资本及财产皆为社会共通生活之结果,以为私有实为不当,宜归之社会公有”。

三是社会民主主义。“谓现社会之生产手段,皆归于少数富人之私有,实侵夺大多数人之自由,宜以一切之生产手段归之社会共有,由社会或国家公经营之,废止一切特权,而各个人平等受其生产结果之分配云云,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

四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谓现今国家及社会之组织不可破坏,宜假国家权力,以救济社会之不平均,改良社会之恶点云云,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

按我们今天的了解,第二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时的情形,即生产资料全归公有,消灭了一切私有财产,所有人按需分配。第三种则基本上属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公有,但个人尚可保留一定的私有财产,按人们的能力和贡献的大小获取报酬,即按劳分配。不过宋教仁所理解的第三种社会主义,是谋求“参与政权”,然后“改革现在之主权者与政府之组织,并一切生产分配手段”,宋教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似乎此种社会主义运动不是采取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因此与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列宁主义并不同,更像是曾被列宁批评过的改良主义。

宋教仁评论道:“四派之根本理想与见解虽各不相同,而要皆有其立足点,以卓然成一家言,且皆有其手段,推行运动,以期其理想的社会之实现。”在总的同情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

宋教仁认为,上述四派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有前两者,即无治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他两种,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则不然,前者所主张仍非政治权力不能实行,实不过改良国家组织与国家经济组织之说,而不可语于改革社会组织,谓为社会主义,毋宁谓为社会的国家主义;后者乃国家政策之一端,其所主张,不但不能改革社会组织,且与“主义”二字亦相去远甚,只宜称为社会的政策。

那么,前两种在宋教仁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呢?按宋教仁的思路,“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良结果是什么样的呢?会是“真正之自由平等”,“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之景象”,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原文作‘货物弃

于地’——引者) ,不必藏于己者 ,夫然后实现于今日 ,各国社会主义学者所拟之理想的社会而求之不得者 ,而吾人竟一跃而达”。但是 ,宋教仁认为 ,要实现这种制度 ,必须是“国家之内部外部皆已康乐和亲 ,达于安宁之域 ,而无待维持 ,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皆已充实发达 ,臻于幸福之境 ,而无待增进 ,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皆已圆满调和 ,适于生活之用 ,而不必再求满足之方”。显然 ,中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

另一方面 ,实行真正社会主义所可能得到的“恶结果” ,则是一幅很不美妙的图景 :

政治或不足以维持安宁 ,增进幸福 ,财产或不足以满足国民生活 ,国家之内部外部忧患丛生 ,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颓落备至 ,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耗竭凌乱 ,莫可名状。国之所以幸存者 ,盖亦不过赖有此仅存之政治与财产制度以为维系 ,一旦变本加厉 ,并此而去之 ,人类社会必至全然不得安宁幸福及生活 ,以成为毫无秩序之世界 ,亡国灭种之祸 ,因是促成 ,乃至欲求政治与财产制度时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 ,画虎不成 ,反至类狗 ,吾人试想像此悲惨之状况 ,其亦不能不生恐怖之心矣。

宋教仁虽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 ,但从他的行文思路看 ,显然他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宋教仁的意见应系有针对而发。20 世纪之初 ,中国尚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但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者则大有人在。1907 年 ,革命党人张继和刘师培在日本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 ,办《天义报》 ,宣传无政府主义 ,章太炎也曾参与其事 ,日本由马克思主义转为无政府主义的幸德秋水与他们引为同道 ,互相影响。在欧洲巴黎 ,另一些革命党人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创办《新世纪》 ,也宣传无政府主义 ,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① 显然 ,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宋教仁 ,不可能同意无政府主义者不要政府甚至不要任何社会的观点 ,这就是宋教仁对前两种社会主义提出疑难的原因。上一段 ,笔者之所以用很长的引文 ,是想让读者体会宋教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但是 ,宋教仁对后两种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并未评论 ,只是认为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笔者综合宋教仁此前此后的言论 ,认为他倾向于平均地权和“国家社会主义”。1911 年 ,英国国会通过《国会法案》 ,削减上院的权力 ,也即削减贵族的权力。宋教仁写了文章评论此事件 ,文章的发表与前述的《社会主义商榷》都是在 1911 年 8 月。文章中说 :

“更有一影响及于英国政治者 ,则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英人以重保守之故 ,原无多数人主张急激之社会主义 ,故希望政府之行社会政策者不鲜。前次政府所提出预算案 ,虽以有土地增价税计划为上院所斥 ,然一般人民甚欢迎之。兹上院之否决权既被制限 ,此后之财政法案既可由下院自由决定 ,则此土地增价税计划必见诸实行 (即以土地价格为标准之单税论 ,谓土地不由自己之勤劳 ,仅以社会经济上之变化而自然增加价格者 ,则依其价格加税) ,且与此计划相类之政策 ,亦或逐渐发生 ,亦未可知。夫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实行方法固甚多 ,然重征土地税 ,固亦社会主义中之一大主张也。此社会主义中之一大主张 ,而竟实行于素重保守之英国 ,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将风靡世界之大势 ,盖又可知矣。”^②

孙中山最初阐述平均地权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核定低价 ,涨价归公”。宋教仁认为英

^① 今日中国人常以为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常在一起倡导社会改革运动 ,大可视作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这也是宋教仁将无政府主义列为社会主义之一端的原因。

^② 《英国之国会革命》 ,《宋教仁集》 ,第 302 页。

国的土地增价税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而其表述也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表述相同。宋教仁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将风靡世界”。显然“风靡世界”,也包括了中国,这意味宋教仁对“涨价归公”的认同。结合前面所引《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中的论述,可见他的见解是成熟的,并非偶然而发。

而在宋教仁的文章中,更多的表述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政策。换句话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比较多地关心预防将来的贫富分化以及劳资矛盾,而宋教仁的国家社会政策除了与宋教仁同样的关心外,又希望借助此种政策更快发展经济。在宋教仁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以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经济、直接经营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因为有国家的力量,可以较快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是用国家权力,适当压抑、调节贫富不均,就是前面所引宋教仁关于民生主义的谈话,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发生,从而尽量避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要是为了解决工业化以后的垄断和贫富悬殊问题,但对较快发展经济似考虑不多,而宋教仁似较多关注此一问题。

在1913年初也就是宋教仁被刺前夕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宋教仁就主张铁路、电信、邮政、海外航运等由国家直接经营。^①在另一篇《中央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中,关于中央重要行政,宋教仁列出了诸如“国营实业”、“国营交通业”、“国营工程”等项目。可见其主张是一贯的,深思熟虑的。在民国元年短暂的农林总长任期中,宋教仁也曾有过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

我们观察,与政治上希望较为原汁原味的西方式民主不同,宋教仁的经济主张不同于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强调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主张。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仅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必须将政府主导这只“看得见的手”和自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灵活运用。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经营涉及经济命脉的产业,这些措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效果。甚至在西方国家中间,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国家也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宋教仁是感受到了这种趋势。

余论

如前所述,宋教仁赞同民生主义,但他似乎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常常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宋教仁却不这样认为,民生主义也好,社会政策也好,在宋教仁眼里,虽然他愿意实行,但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另外,宋教仁也没有象孙中山那样,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或认为实行了这些社会政策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在宋教仁的心目中,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策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而在宋教仁眼里,民生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社会革命。

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对社会主义表现了一定的兴趣和同情。比如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著作;廖仲恺则翻译《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刊登在《民报》。

^①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集》,第491、494页。

又如与宋教仁感情深厚的黄兴和谭人凤。黄兴在思想方面的表述不多,但在讨论未来中国国旗式样时,曾提出用井字旗,以象征平均地权,^①可见黄兴的内心是完全认同平均地权主张的。民国建立以后的一次演说中,黄兴支持成立工人团体“工党。在湖南实为重要……夫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为中国隐患。如欲免此隐患,须使其互相联络,劳动家出力,资本家出钱,合谋利益,则结果必为良好矣。”同一篇演说中还说“社会党与自由党。对于民生政策,极能主张。兄弟可代表其无欧美之无政府主义。惟须谋全国人民幸福,须求政府发达经济,使贫民能无所痛苦,斯为得耳。现在地价税可行,社会党有主张单税者。盖中国土地税如增加起来,则单税本可敷全国之用。因今土地多无税,且房屋未还税,中央政府将来必行此策,只须社会、自由两党促其进行。”^②从这篇演说的片段语言中,我们可以分析黄兴的理念:(1) 希望避免资本家与工人的冲突;(2) 经济的发展工业的进步要使全民受益,特别是贫民受益;(3) 实行“涨价归公”的地价税。这与孙中山、宋教仁的想法都非常接近。谭人凤在《粤汉铁路说帖》中说“铁路发达,首推英美。然公司势力专横,左右金融,收买政客,抑遏他业,苦累遍氓。我国幸未至此,正宜引为前鉴。况今日讲求民生主义,无非欲全国资财分配于一般人民,而不愿集中于少数团体之手。倘路归商民个人私有,则此主义终难实现,国民必有陷于痛苦之一日。故今日不讲民生主义则已,欲讲民生主义,当先防异日大铁道公司之弊。欲免此弊,须使铁路归国家公有,以杀其势。此国有政策合于民生主义者一也。”^③谭人凤把民生主义当作前提,并把铁路国有作为实行民生主义,避免大公司垄断的手段之一,可见他的观点。举黄兴和谭人凤作为例子,笔者一要说明宋教仁会与他们互相影响,二要说明革命党人的思想倾向。顺便再说一句,开头注释中提到的胡汉民并不反对民生主义,由他撰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之三即“土地国有”,文中又赞扬社会主义。^④ 这些行动,也许预示了中国思想和历史将要走的方向。

(作者通讯地址:迟云飞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089)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 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42页。

② 刘泱泱、陈珠培、刘云波编:《黄兴集外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0页。

③ 石方勤编:《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④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1—383页。